

大陸附庸黨派政治處境之分析

邢國強

一 問題的提出

毛匪澤東以井崗山流寇起家，竊據大陸，曾自承其賴以獲得叛亂成功的三大法寶，為「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及「統一戰線」，在這三項法寶中，細析之，有若干異同之處，「黨的建設」與「武裝鬥爭」，是屬於實體的鬥爭，「建軍」「建黨」，都需要有偽黨與偽軍，以血汗為其犧牲，方能達到一定的叛亂成果。而「統一戰線」，則為一種無形的策略，一種毒辣的陰謀，所依靠的是「敵方」的力量，利用「敵方」的力量，來壯大自己，削弱敵人，按照唯物辯證法中質量互變的法則，使雙方力量的強弱，轉變移位，達到叛亂的目的。這種兵不血刃的毒辣手段，不知有多少人為其所愚弄、所欺騙，直至今天，仍有許多姑息主義者，繼續為其蠱惑而不自知。

回顧數十年毛匪叛亂史實，其所使用之「統一戰線」策略，可分幾個範疇來說明：在完成共黨戰略要求下所使用的「統一戰線」策略，是指民國十一年匪黨決定之「聯合陣線」，與民國廿五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兩次偽裝合作而言。尤以後者，在流竄西北瀕臨滅亡之際，共匪藉「統戰」口號，扭轉當時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獲得生存。在實施此項陰謀過程中，主要為利用中層的「統戰」手段，因而產生了三十年代文藝思想界的拉攏，與所謂「民主黨派」的籠絡。在下層方面，則於其割據區中，偽裝以「土地改革者」自居，掩藏其「打土豪、分田地」的共產暴政，代之以「減租減息，交租交息」等溫和政策，並將農村鬥爭層次劃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等，遂級鬥爭打擊，達到清除「階級敵人」的目的，其他如「三三制

」政權形式等，均為代表，這種手段，有人稱之為「剝蕉」政策，正如「剝蕉」般的愈剝愈深，直至整個蕉葉剝完為止，可謂惡毒之至。

關於三十年代文藝界之利用與清算情形，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各方論述甚多。至於在農村中使用的「統戰」策略，亦可自共匪竊據大陸後經過「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革」的過程中，看出其陰謀所在。一般較不為各方注意者，乃共匪藉「統戰」所利用下的各個附庸黨派，自稱為「民主黨派」的一部份，共匪究竟如何從利用到迫害，從拉攏到打擊，值得加以說明，一方面可以從這個具體的問題上，看出共匪對這些「統戰份子」之立場，另一方面，亦可看出這些附庸黨派處境之悲哀。同時，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毛匪竊取政權，依賴「附庸黨派」的功績不少，在毛匪「新民主主義」與「聯合政府」兩文的招納下，多少造成了以後共匪偽政權的特定形式，不同於俄共革命後的單純，在推行其獨裁專政的體制方面，亦多少形成了許多累贅，許多絆腳石，十餘年來的內部動亂與整肅，與這些「附庸黨派」不無直接間接的關係，際此共匪高唱「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之時，將此問題，提出來加以研究，亦不無意義。

二 附庸黨派的評述

受毛匪偽政權卵翼的附庸黨派，共有八個團體，其中「中國民主同盟」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在共匪竊據大陸以前，即已具有較多規模的羣眾基礎，其餘「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致公黨」及「台盟」等，則或為共匪竊據大陸後新建立之組織，或為舊

黨派改組為新黨，茲將以上各附庸黨派的概略情形，作一簡單的述評。

「中國民主同盟」：其前身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是在抗戰後期重慶大後方的知識份子與各黨派集合而成，當初的目的，是希望能有第三個力量來排解國共之間的若干紛爭，共求國是的推展，係以政團為單位，無個人之參加。最初加盟者計有青年黨、民社黨、第三黨、村治派、救國會、職教社等六個團體，由於共匪利用親匪之美國駐華使節，以及偽「新華社」之宣傳機構，大量歪曲國共紛爭之事實，在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鄧穎超、章漢夫、龔澎、喬冠華、戈寶權等匪的連絡煽動下，逐漸地誘使「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趨向親匪，成為共匪的統戰工具，其時，民青兩黨以其立場轉變，毅然退盟，而「民盟」亦同時為了擴大組織基礎，允許個人入盟，共黨份子乃得藉機大量滲入。共匪竊據大陸後，救國會宣言解散，村治派因梁漱溟之反共，而遭共匪命令終止活動，職教社改為「民主建國會」，第三黨早已改為「農工民主黨」，均先後脫離「民盟」，於是「民盟」乃形成為單一的政黨組織。

「民盟」成員，都為左翼政客與文化界知識份子，大陸變色以前，對共匪輔助甚多，影響亦大，大陸陷落以後，該盟仍有很多的羣衆潛力，並控制有「光明日報」的偽宣傳機構，共匪亦對該盟，頗為重視，故當初在偽政協集會後，共黨限定各黨派發展方向時，對「民盟」則以文教界為發展範圍，較為寬大。在偽政權機構中，曾經由該盟人員擔任較高職務者，計有偽政府副主席張瀾（已死），偽最高法院院長沈鈞儒，偽交通部部長章伯鈞，偽司法部部長史良，偽森林工業部長羅隆基（已死），偽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薩空了等。以上共匪優遇情形，可謂曇花一現，未幾，毛匪澤東號召各附庸黨派及知識份子進行「大鳴大放」，「民盟」份子中有很多中小學教師，略富正義熱誠，匯合該盟上層知識份子，對共匪大肆撻伐，這種天真的行動，正中毛匪陰謀詭計，當「鳴放運動」一變而為「反右派鬥爭」時，該盟人士大部列為匪方整肅對象，如較有名的「章（伯鈞）羅（隆基）聯盟」反匪事件，株連甚多，反右派中被整之較有名人士，計有儲安平、葉篤義、沈志遠、馬哲文、潘光旦、許傑、曾昭掄、潘大遠、錢端升、韓兆鵬、張雲川等人。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係閩變失敗份子結成，正式組織，

大陸附庸黨派政治處境之分析

發起於民國卅六年，由李逆濟深領導在港成立，重要份子有馮玉祥、陳銘樞、何香凝、朱學範等人。另一方面，以蔡廷鍇為主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早已勾結十萬大山土匪，編成「民主聯合軍」，擾亂後方。其餘以和談中充任代表之邵力子、張治中諸逆，則在北平發表擁護毛匪聲明，組織「國民黨民主派」，以上各方面集結的政客集團，當共匪竊據大陸後，即命令集中改編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為目前的「民革」。

共匪對「民革」之利用，是因為這些份子與在台軍民之歷史關係比較密切，所以很多對台廣播，都是由「民革」人士充任，換句話說，共匪所以讓「民革」存在，主要是因為有我政府存在，此地有一個笑話，反映偽民革的心理：有次黃逆紹竑與薩空了閑談中，薩空了諷刺黃逆紹竑穿着披氈很像蔣委員長，黃逆答以「不像，不過迄今仍在吃蔣委員長的飯，却是事實」，足見附匪黨派人士心理之一斑。

偽「民革」自李濟探死後，由何香凝出任主席，在初期亦有部份不重要的部長，由「民革」充任，如偽農業部長李書城，偽林業部長劉文輝，偽郵電部長朱學範，偽紡織工業部長蔣光鼐，偽衛生部長李德全，（傳作義任偽水利部長，但非「民革」份子），省長方面，亦有湖南省長程潛（已死），甘肅省長邵寶珊（新近死亡）等人，迄今似祇留下偽郵電部長朱學範一人，而朱已參加匪黨。

「民革」受共匪迫害者，乃限制其發展方向為遜清遺留官吏，政府遺留在華北地區之官員，這些人士，除了大多遭受清算外，在年齡上亦至少超過六十歲，均屬老邁，此種限制，無形中使「民革」自趨式微。其次，在民國四十六年「鳴放時期」，「民革」份子反毛言論亦多，當反右派鬥爭中，如龍雲（已死）、陳銘樞、黃紹竑、譚惕吾等均遭批判。李逆宗仁再度投入火坑，是否依附在偽民革之旗號下，不得而知。

「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為江浙學閥黃炎培組成，其前身為「職教社」，民國三十五年改名為「中國民主建國會」，原來基礎，以江浙兩省之中小學教員為班底，抗戰勝利後，在滬大量發展社員，逐漸變質，以工商界人士為主，共匪竊據大陸後，規定其發展方向為工商界人士，乃正式與教育界絕緣。

共匪利用「民建」的原因，是因為在工商界方面尚有潛在的力量，惟自民國四十六年匪區實施公私合營後，對工商界的控制，已告全面完成，一方面對「民建」的利用價值已大為減少，同時，「民建」的組織，無形中成爲共匪控制工商界之障礙，「鳴放」時，章乃器對共匪批判甚烈，因而被牽連在「章羅聯盟」中，被免除僑糧食部長職務，其餘尚有盛丕華（已死），畢鳴歧、榮毅仁等重要份子被鬥。僞「民建」份子，在僞政權中曾任較高職務者，計有僞政務院副總理黃炎培（已死），僞糧食部長章乃器，僞輕工業部長李燭塵，僞上海市副市長盛丕華，僞輕工業部部長後改任僞糧食部長之沙千里，除沙千里外，其餘均已免職。

「民主促進會」：係滬地之教育界失意份子組成，以馬絨倫爲首，魯迅之弟周建人，妻許廣平（已死）等，爲其組織中之招牌。民國三十五年，政府軍隊進剿蘇北，直搗匪巢淮陰，共匪深感威脅，乃策動京滬教育界人士，發動請願，挽救其危機，而民主促進會馬絨倫，曾率團自滬赴京請願，出力特多。因此事件，故共匪竊據大陸後，尙能讓予該會一席之地，並昇子馬絨倫以僞教育部長之職，一方面當然藉其控制教育界，未幾，馬絨倫調任僞高等教育部長後去職；目前在僞政權中，僅有周建人尙爲此次「文化大革命」以後僞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要可能還是已死文人魯迅的關係，而非「民促」的關係。

「農工民主黨」：其前身爲「第三黨」，歷史雖久，但黨務之發展最差，創辦人鄧演達，頗著聲譽，鄧死後，由章伯鈞負責，目前則由共黨份子季方擔任黨魁，「農工民主黨」黨勢所以衰弱，其有兩點原因；第一點是章伯鈞兼任「民盟」副主席，無暇兼顧「第三黨」工作。其次則爲發展基礎落空，變成寡頭政黨，因爲「農工民主黨」黨務，顧名思義，以農民、工人爲黨務推展的對象，與共黨的羣衆基礎，引起直接衝突，毛匪以工人農民爲其叛亂專政之資本，決不肯讓其他黨派侵蝕，故共匪早於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時，曾嚴格聲明僞人民解放軍、農民、勞動工人這三者間，決不容許附庸黨派在其中進行發展工作，如此一來，「農工民主黨」豈非成爲寡頭黨派，無羣衆基礎可資發展，其黨勢亦逐漸低落。

「農工民主黨」份子在反右派鬥爭中，被整亦多，如黃琪翔、王一帆、

王寄一、李伯球、李健生、楊逸業等人，可稱枉者。

「九三學社」：民國三十三年在渝成立，當時名稱爲：「民主科學座談會」，後改爲「民主科學社」，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改爲「九三學社」，原爲一學術團體，乃一些大學教授組成，人數不多，雖無黨派形式，但共匪則以政黨目之，尤以社員中具有素質優秀之學者較多，故共匪對該社尙屬優遇，惟在反右派鬥爭中，仍無法避免遭受批判，包括主席許德珩（曾任僞水產部長），中委周拾稔、陳時偉、高覺敷、陸侃如、董渭川、薛愚、顧執中等人，該社另有一副主席梁希，曾担任僞林業部長，已死。

「致公黨」：海外華僑洪門組織，哥老會支派，原甚反共，後爲共匪滲透局部轉爲左傾，大陸部份組織，則傾向匪黨，以陳其尤、陳演生等爲其組織代表，共匪爲利用該黨進行對華僑宣傳，及擴展影響，乃承認其合法的地位，惟其黨員發展範圍，限於海外華僑，故黨員人數甚少。

「台盟」：原名爲「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係日共遺留之匪黨份子謝雪紅在香港組成，名雖實行台灣自治，實際上乃共黨之外圍團體，目的在進行對台之滲透，該組織在台滲透部份，多爲我國治安機構破壞，甚難活動，至於在匪區部份，則由謝匪領導，當時謝匪身兼青年聯合會主席、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政協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匪蘇友好協會理事等職，相當活躍，民國四十二年底，謝女被匪鬥爭，所有職務均告取消，由李純青者繼任，李匪復因在鳴放期間言論不當，遭匪逮捕，下落不明，目前該盟主席由徐萌山者充任，無大發展。

三 共匪如何迫害附庸黨派

前面說過，共匪對各附庸黨派之拉攏，是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是在分化敵體，轉變敵對力量強弱的一種手段，一種策略，而不是根本的目的，因此，當敵對的力量失去平衡的情況時，則「統戰」工作的需要亦相對地降低，當大陸沉淪之後，附庸黨派的命運，亦就日趨暗淡，不過，在共匪企圖消滅這些代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附庸黨派時，爲了顧慮到對內外各方面的影響，在方式方法上，不得不採取較爲慎重而具有毒辣的手段，使

這些對共匪存有幻想的黨派，能在不知不覺中，爲其所淘汰與控制。根據十餘年來共匪對附庸黨派打擊迫害的手段，可以分爲下列數方面來說明：

一、限制發展：任何黨派要維繫其生存，必須要有羣衆基礎，以及幹部之間的不斷保持新陳代謝的作用，吸收新血輪，充實新幹部，故發展工作爲任何黨派的重要工作。共匪爲了打擊各附庸黨派，第一步手段爲限制發展，其方法爲規定各黨派的發展方向，劃清界限，不得逾越，對農民、工人、與僞軍三方面人數最多，基礎最重要者，首加限制，任何附庸黨派，不得在農民、工人與僞軍中發展，並規定「民盟」以中小學教員爲對象，「民革」以遜清官吏與政府在華北之地方官吏爲對象，「民建」之發展限於工商業人士。「九三學社」以大學教授及專家學者爲主。「民促」之發展以文化活動者爲限，「農工民主黨」則無發展方向，成爲空頭政黨，「致公黨」以華僑爲吸收對象，「台盟」則以台籍人士爲限，如此，則各附庸黨派，很顯然的會因缺少發展與新的成員，而逐漸趨向式微，自我毀滅。

二、釜底抽薪：共匪一方面限制各附庸黨派發展黨員，同時，匪黨却可吸收各附庸黨派份子入黨，此事發生在民國四十二年匪黨通過一發展黨員放寬條件的決定，重視在高級知識份子與各附庸黨派中吸收黨員，一時，各附庸黨派均感到直接威脅，據說，當時號稱無黨無派之郭匪沫若，亦在其時加入匪黨，餘如僞民盟之吳晗（三家村反毛事件主角），僞民革之李德全，僞九三學社之潘菽等，均先後加入匪黨，此種釜底抽薪的辦法，使得各附庸黨派之組織，逐漸變質，可謂毒辣的手段之一。

三、滲透控制：除了公開的吸收各附庸黨派人員加入匪黨以外，並在暗中佈置重要匪幹，控制各黨派組織，如以楊明軒（已死），史良等控制「民盟」，以李德全、朱學範等控制「民革」，以孫起孟、南漢宸（已死）掌握「民建」等，均爲實際例證。

四、迫害交心：民國四十六年，共匪以「大鳴大放」爲號召，鼓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誘使各附庸黨派份子，儘量發表反匪言論，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時四處開花，各地鳴放，突然之間，毛匪下令進行「反右派鬥爭」，矛頭一轉，針對這些「鳴放」份子，大加批判，於是「章羅聯盟」的反共陣線，亦告「揭發」，牽連所謂「民主人士」，人數不

少。民國四十七年，毛匪復提出應即進行「交心運動」，下令各附庸黨派自行改造，同年三月十六日，各黨派集合一萬餘人，在僞都北平天安門集會，宣佈成立「社會主義的自我改造促進大會」，大喊擁毛，大喊擁護社會主義，大喊共黨萬歲，這種精神上的迫害，已全失去獨立政黨的黨格，處境之悲哀，誠屬可歎。

五、全面打擊：匪黨內部派系紛爭，外受俄共關係之惡化，內受劉匪少奇等之作亂，毛匪威信喪失，矛盾日深，因而爆發全面性的「文化大革命」。在開始之初，則以清算文化界「民主人士」吳晗與周谷城等開始，逐漸轉向至黨內奪權鬥爭，其程序上所以先自黨外開始，原因爲毛匪一貫認爲黨內派性係「社會上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而各附庸黨派的言論、份子，莫不代表舊社會的舊階層，與舊社會的舊思想，於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立四新」的口號下，首先各附庸黨派遭到嚴重的打擊，根據美聯社民國五十五年八月間報導，匪黨「紅衛兵」闖將，在八月廿三日向八個附庸黨派發出最後通牒，限令在七十二小時內自行解散，不得活動。同月廿五日，僞民盟首先張貼佈告，表示即行停止活動，接着，僞民革亦宣佈結束其總部活動，等情。其餘各黨派有無此項聲明，尚無具體資料證明，但猜想起來，亦不可能例外，因而，我們可以說，毛匪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一切對外對內之統戰工作，可謂全面否定。本年九月五日，二十九個僞省市級革命委員會宣告全部成立，僞人民日報及紅旗雜誌，在評論僞革委會成立一事時表示，由羣衆中產生的力量，較單純的以選舉產生者爲佳，說明一切將不按法規辦理，僞人代會與僞政協會的是否繼續舉行，已大成問題，今後各附庸黨派的名義是否尚能存在，亦無法預測。

四 附庸黨派份子的前途

共匪對各附庸黨派的態度，是有其基本的立場的，過去所以有這些盲目的同路人，爲其搖旗吶喊，供其利用，原因爲未曾對共匪的基本立場作過一番研究與認識，因而墮入圈套，而不自知。

要說明共匪對所謂「民主人士」的態度，祇要以本年四月共匪「紅旗」雜誌社論「對派性要進行階級分析」一文中的幾段話來作註釋，即可看出其

基本立場所在：該文引述列寧對階級的分析時稱：「階級劃分是政治派別劃分的最根本的基礎，它歸根到底總是決定着政治派別劃分的」，在階級社會中，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並以黨派鬥爭的形式最充份的展開。政黨和政治派別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毛匪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以上這幾段話，說明了共匪對黨派問題是站在階級的觀點上來分析，來對待的，而不是以各黨各派的政見，以往賣身「功績」，或者各個黨派負責人的聲望等來決定的，既然是以階級為出發點，則除了能代表所謂「無產階級」（雖然實際上不盡善，但口號上是這樣講的）的共黨以外，即無其他黨派可以存在，在未消滅前，是所謂「黨外有黨」，如果有其他黨派亦代表「無產階級」來參加「革命」，這便成為「黨內有派」了，亦同樣不能存在，所以代表「無產階級」是共黨的專利，除了共黨專政外，並無其他黨派可以分潤。雖然共匪竊取政權以後，所有財富集於毛匪一身，實質上已經過着資本家的生活，但因為毛匪是共產黨，故仍代表「無產階級」，其餘各附庸黨派，如果認為自己未能代表「無產階級」，則其命運已早決定，要逃避滅亡的命運，祇有祈禱早日轉移共匪政權，如果想要改變共黨立場，是不可能的。

其次，毛匪對各附庸黨派的迫害、改造，亦有其一定的原則的，這個原則，可以說是共黨的基本矛盾因素之一，因為共黨一貫以「唯物史觀」為其分析事物物的消長，然而在政治鬥爭上特別着重精神上的批鬥，所謂「意識形態」的改造。毛匪曾經說過：「黨內的派性鬥爭，主要為社會上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階級社會中，存在不同的階級，在各個階級內部，又存在不同的階層，各個階級和階層，在政治鬥爭中，都會有左、中、右各派的區分，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普遍規律。毛匪說：「除了沙漠，凡有人羣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還會是這樣」，這一「不斷革命」的理論，在今年十月卅一日的匪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中，又加強調，「進一步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極其深遠的意義」。因而，我們可以看出，大陸各附庸黨派由於階級成份與共黨不一致，注定了被整肅的命運，但另一方面，階級意識的改造，決不會因為組織的解體，而全部融於共匪，相反的，所潛存的思想意識形態，仍需要毛匪澤東作一萬年的不斷革命，才能完全消滅，當然，這個時間實在太長了，用不到推測的那麼久，不過仍需要長期的鬥爭，則是毛匪承認了的。如果各附庸黨

派潛存的反共意識，再作傳播與擴展的話，豈非更易激起共黨內部派系的動變，因而，作者認為我們對大陸附庸黨派的政治處境，應該從其潛在的意識方面來觀察，不要單以垂死的組織來分析。大陸附庸黨派份子，其中仍不乏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意識形態，祇要能恢復中國士大夫應有的精神，並且將這些文化意識，傳播擴散，相信對我們的政治反攻，是有幫助的。古代歷史中多少暴君，企圖消滅人的意識，均沒有成功，最後還是落在人民的後面，宗教、藝術、文化、科學，這些人類智慧創造的結晶，是決不會毀滅的，除非負責傳播的人們，本身已喪失了意志，否則總能有繼往開來的一天的。大陸附庸黨派份子，經過這次「文化大革命」以後，祇有澈底覺悟，羣起反共，才有自由光明的前途，這是作者分析若輩政治處境以後的一點感想。

——上接第51頁——

衛兵能掛帥嗎？今天上台，明天就會被打倒，正因為是他們政治上不成熟。……紅衛兵不行，沒有經過鍛鍊，這樣大的事情信不過他們。」「本來想在知識份子中培養一批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份子，包括仍在學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識份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因為解放十七年來，文化教育修正主義份子把持者，所以資產階級思想溶化在他們血液中的，所以要革命的知識份子必須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關鍵的階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觀，否則，就走向革命的反面。」「（註一一）因此，毛澤東要對老知識份子以及新知識份子，普遍實施「再教育」。

上述的四點，前兩點是理論問題，後兩點是實際問題。這四點恰好說明了毛共與知識份子之間的基本矛盾：前兩點說明了毛共對知識份子的歧視，後兩點說明了知識份子對毛共的反抗。

毛澤東對於知識份子，也許是因為「資產階級思想溶化在他們血液中」，所以恨之入骨，始終強調知識份子應向工農學習，以打擊其自尊心，貶低其社會地位，並曾以「牆頭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之聯語，嘲笑輕蔑知識份子。在「文革」期間，大陸知識份子在「川反份子」（按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走資派」（按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國民黨特務」、「美國特務」、「蘇修特務」、「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等等罪名下，已經受盡屈辱、折磨、和迫害。如今在「再教育」的政策下，處境更為惡劣，「最近以來，有人不分青紅皂白，把所有的知識份子統統叫做『老臭』，有的人甚至把知識份子排列在①叛徒、②特務、③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④地⑤富⑥反⑦壞⑧右之後，說什麼『知識份子都是臭老九』。」「（註一二）足見今日大陸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較之古代的所謂「九儒十丐」，更卑賤低下！